

## 再論黃河河源問題

黃 盛 璋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作者在科學通報 1955 年 6 月号看到李元星先生的“黃河正源知識的年代上限問題”，李先生根據一張來源很容易清楚的明代楊子器圖，認為此圖關於黃河河源知識，“達到了在基本輪廓上接近於今天這種的知識”。這張圖在星宿海的下面是拖有兩條很短的尾巴，李先生據此推斷這就是現在黃河正源約古宗列渠及其支流，因而推論唐代跟元代就已找到了黃河正源約古宗列渠。李先生甚至把正確的黃河河源知識推到釋氏西域記的“阿耨達山”，要是科學研究重在符合實際，而不是用牽強附會的方法把年代推得更遠為可貴的話，那我認為李先生的說法完全是不對的，頗覺得有責任要為這個史實說幾句話。

### 一．楊子器圖河源部分的來源問題

李先生推論的根據是靠明代楊子器系統全圖，若干年來作者留意過不少幅的明清時代的古地圖，現將楊子器系統全圖的來源是什麼，完全可以弄清楚。李先生列舉此圖河源部分四個來源，有三個可以說毫不相干。第一個釋氏西域記的“阿耨達山”，此山在印度新頭河（即印度河）的源頭，凡是看過水經注的人不用說是知道這是怎麼一個荒唐神祕的附會。第二個唐代關於黃河河源的知識跟第三個南宋時代的地理圖，兩者來源實即一個，不能分開，宋代自臨夏以上以迄黃河上游，久為唃廝囉所據，大渡河以西亦非宋有，南宋時代的地理圖關於河源知識一切都承唐而來。李先生曾提到唐賈耽的“海內華夷圖”，賈耽不只有此圖，他還有“吐蕃河源錄”跟“隴右山南圖”，記載黃河源最詳細的就是隴右山南圖及說。賈耽的著述宋代就都不在，但賈圖系統尤其是黃河部分的大致輪廓迄今還不难找到，偽齊阜昌七年（1137 年）上石的華夷圖跟禹迹圖就是賈圖的縮本，今存西安碑林，我們不难比較楊子器圖，看看能不能扯上關係。

楊子器圖來源是什麼，作者想凡是稍稍研究過古地圖的人一看就看得出，它毫無疑問來自朱思本的輿地圖，朱圖也曾上過石，但原圖現在看不到，現在所能看到的是羅洪

先据朱圖增廣的廣輿圖。下面把羅圖中黃河圖的河源部分節印出來，跟楊子器圖河源部分对照，逐一比較兩圖的相应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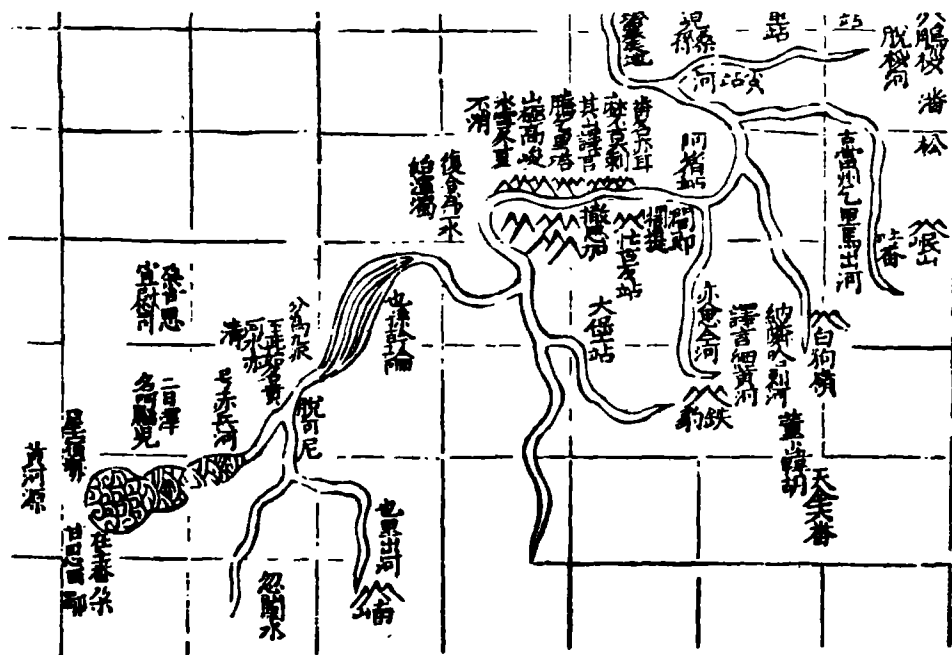


圖 1 羅洪先廣輿記卷 2 黃河圖中的河源部分(据清嘉慶翻明方輿輿)

从李文刊出的楊圖河源部分最北面一条河數，第一条河是羅圖的鴨綠河（或脫穆河），第二条为羅圖的乞里馬出河，第三条即羅圖的納鄰哈刺河，这三条就是清代探河記錄中的三崑都崙河，也就是現在松潘茂草地上的白河、黑河跟宜柯河，作者別有文考証。第四条是羅圖的亦八思今河發源於鉄豹嶺者。在星宿海的上头那个九渡河即元史河源記“歧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这是朱圖系統一个很好的标志，凡是出自朱圖的一定有这个东西。九渡河上头那一条河（东南边上源歧为兩大股者），即羅圖旁注“大堡站”那条河，根据元史河源記引“思本曰”，此河叫做“怀里火秃河”。最後說到楊圖星宿海下面拖出那兩条尾巴，依作者推测，應該就是羅圖上的忽蘭水跟也里出河，左边叫“忽蘭”，右边叫“也里出”。羅圖星宿海画成三个球狀湖泊相連，所謂“連屬吞噬”，楊圖此部正好相同。然而羅圖的忽蘭水跟也里出河在星宿海的东边，楊圖这部分沒有相当的河，以全圖系統看，很可能楊圖把它挪到星宿海的下面，古代繪圖有時不很精確，作者就藏有明代出自朱圖系統的殘本彩繪圖把黃河的源头画得很不像样。此外，作者还記得清初出自朱羅系統的墨繪圖把黃河源头画成一条小尾巴拖在星宿海的下面，跟楊圖情形很相像。还有一点可以推断楊圖这两条尾巴有任意繪製的可能，“黃河源”的上头



圖2 楊子器系統全圖中的黃河源部分

繪有一座山，名“阿耨達山”，这是根据水經注所引釋氏西域記，据此記所載，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而傳統的說法也是認為黃河是出自崑崙的。因此酈道元就把黃河源头推到印度河的發源的阿耨達山。楊圖繪“黃河源”發源於此山，這並不能證明他對於黃河源知識有正確的了解，相反的倒可以證明這兩條黃河源很可能是出於任意或想像。

楊圖並不是出自羅圖，而是直接出自朱思本圖（羅圖在楊圖之後約十多年），羅圖的忽蘭水跟也里出河在星宿海的上面，楊圖兩河則在星宿海的下面。若說這兩者就是一個，除兩圖本身的對比外，一時還沒有找到旁證，上面的推測能否成立，現在還不能完全肯定。不過楊圖出自朱思本系統那是沒有多大疑問的，朱思本所記元代黃河源是那一條，他自己有詳細的記載，等到下面討論朱思本記錄中的河源部分，就不難斷定能不能跟黃河正源約古宗列渠扯上關係。

唐以後古地圖發展可以分為三個系統：賈耽系，朱思本系，清初測繪系。三系的分界恰恰都以黃河源知識發展為標誌，因此判斷古地圖屬於那一個系統，河源部分的鑑定是其中很好的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時代愈近愈有用。尤其是用來判別明末清初跟康熙、乾隆的時代，康熙、乾隆時代之分該是頂不好辦了，可是利用河源部鑑定有些還是可以辨別出來。作者沒有看到楊子器圖，但李文刊出來的恰恰就是河源部分，此圖既出朱系，依作者推料，圖上應該具有那些特點，應該繪有那些東西，因與本題無關不必細說，茲就跟黃河附近有關部分談一談。黃河東南面那些山、那些河都可以找出相應位置、名稱，其部位都跟羅圖一致，羅圖星宿海東南是瀾滄江源，楊圖正是同樣。羅圖已繪有金沙江，但並不認為是長江之源，江源乃是岷江，楊圖要是正確地知道河源，就該知道江源。江源就在河源的對過，而通天河又是當着入藏通道，楊圖江源部分沒有刊出，但作者可以推斷江源應在大渡河以東，松潘的北面，李先生不妨一檢楊圖，看看說的對不對。羅圖嘉靖原刊本不易得，但嘉慶翻萬曆本的廣輿圖容易找到，李先生也不妨找來全部查一查，看看說的究竟情形如何。

## 二. 唐、元、明三代到過的黃河源的正確部位

由於楊圖在星宿海的下面拖有兩個尾巴，這就使李先生有兩個推想：(1)楊子器圖的兩個尾巴已就是現在黃河那兩條上源（約古宗列渠及其支流）；(2)唐代、元代就已達到黃河正源的約古宗列渠。黃河上源不是兩條而是三條，具詳拙著“論黃河河源問題”<sup>1)</sup>這一點正可以說明楊圖黃河源那兩條尾巴多半是出於任意或推想，並不是有什麼事實根據的。李先生第一個推想的錯誤可以不討論，底下討論李先生推想的第二個問題：即唐、元以及明代到過的黃河源究竟在現在什麼地方。

唐代到過黃河源有兩次記載：一次即貞觀九年侯君集、李道宗等追擊吐谷渾，記載這次戰役的在舊唐書是卷2太宗紀，卷60李道宗傳，卷67李靖傳，卷69侯君集傳，卷198吐谷渾傳；在新唐書為卷2太宗紀，卷78李道宗傳，卷93李靖傳，卷94侯君集傳，卷221吐谷渾傳。記載比較詳細的是舊、新兩唐書的吐谷渾傳。茲將有關部分節錄於下：

侯君集與臣夏王道宗趣南路，登漢哭山，飲馬烏海，獲其名王梁何忽，經塗二千餘里空虛之地……又達於柏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舊唐書吐谷渾傳）。

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其名王二十……君集，道宗行空虛之地二千里，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覽河源（新唐書吐谷渾傳）。

柏海又見於兩唐書吐蕃傳，這地方當入藏通道，吐蕃贊普曾率其部兵來此親迎文成公

1) 地理學報，第21卷第3期，1955年9月。

主<sup>1)</sup>，舊唐書吐谷渾傳的“栢梁”就是栢海，这不單有新唐書吐谷渾傳可比較得出，還有舊唐書的侯君集傳：“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栢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所出焉”可証。（其前面一段文字也差不多與吐谷渾傳全同）可是我們看看李先生怎樣根據這項材料下判斷的：

……侯君集、李道宗也領兵到了河源。方向是從東向西，經烏海（鄂陵湖？），“次星宿川”，再向西到達了“近河源的栢海”（即約古宗列灘），再到“栢梁”（“梁”指約古宗列灘西面的一座矮分水嶺），再向西約 20 里就到了河源，在這裏就可以“北（嚴格地說是西北）望積石山”了。<sup>2)</sup>

像這樣不負責任地引用史料，胡亂地解釋，胡亂地下判斷，那真令人不能容忍，李先生憑什麼知道他們先達到栢海，再逆栢梁，憑什麼知道再向西 20 里就到了河源，作者查遍唐代有關這件事的文獻，尋不出這兩項的根據。至於說栢海即“約古宗列灘”，栢梁的“梁”“指約古宗列灘西面的一座矮分水嶺”，除了牽強附會以外，實在找不出為李先生辯護的第二個理由。

唐代第二次到過河源的是劉元鼎長慶二年（821 年）出使吐蕃，這一次記載比第一次詳細，李文所引的“往來渡黃河上流，有三山，山形如鐵，河源在其間”是根據舊唐書吐蕃傳，但記載更詳細的是新唐書吐蕃傳，現在也把有關部分抄在下面：

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也，唐曰悶摩紫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河源東北直莫賀磧尾殆五百里。

劉元鼎入藏路線是哪一條，新唐書地理志跟吐蕃傳有詳細的記載，研究入藏通道及其歷史發展應該是解決唐代河源部位的最正確道路，要是單單靠新舊唐書吐蕃傳關於河源記載，那是什麼也得不出。“山形如鐵，河源在其間”，這是很多河流發源地都有類似的情形，可能喀喇渠的發源地就是如此。康熙四十四年派拉錫等往探河源，他們到達星宿海以西，在這一帶考察了兩日，確定黃河有三條上源，叫做“古爾班索爾馬”〔古爾班（Gorban）蒙語“三”的意思，意即三條索爾馬〕，最長的是南面那支“阿爾坦河”（即今喀喇渠），但這一次認為這三支都是黃河上源，他們的報告中也說黃河源附近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sup>3)</sup>，所以根據“有三山，山形如鐵，河源在其間”的話並不能斷定河源就是現在的正源約古宗列渠。

元代都實的探河源記錄有詳略兩種，詳的就是朱思本從帝師得來譯梵為漢的，元史地理志的河源附錄曾把兩種合為一編，據朱思本記載的河源“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

1) 舊唐書吐蕃傳：“贊普率其部兵山栢海，親迎於河源”。

2) 科學通報，1955 年 6 月號，77。

3) 見計開河源記。

曰敦腦兒”，(oden tala, 按即星宿海)河源在星宿海的西南,方向很清楚,現在的喀喇渠正是自西南流入鄂陵湖,元都實所探的黃河源,可以肯定就是現在的喀喇渠,跟清代阿彌達所探的河源方位一致。總之,無論如何附會不上約古宗列渠上去。

明洪武十一年派宗泐和尚到西域求經,十五年取河源青海路回國,有望河源詩,据其詩序說: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为抹处,犂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犂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為河源。……其源东抵崑崙可七八百里,所涉处尚三百餘里,下与崑崙之水合流<sup>1)</sup>。

这是研究河源史的一个很可宝贵的材料,可以跟刘元鼎的記錄互为印証。犂牛河也見於刘元鼎的入藏路程及新舊兩唐書的多彌國傳,同時樊綽蠻書也有之,它就是現在長江上源的通天河,这是近來大家所一致肯定的<sup>2)</sup>。“处”即藏語“chu”的譯音,意为河或渠。現在藏語称黃河为馬楚,通天河为布壘楚,抹处即馬楚,必力处即布壘楚,抹必力赤巴山意为黃河跟通天河分界之山,实即巴顏喀喇山。清江标的“西繳水道”已經指出“必力处”即“布壘楚”及“处”字之意:

必力处即布壘楚,声相近也。蒙古呼水为烏苏,吐番呼水为楚或榑,故此江(金沙江)上流在青海境則称木魯烏苏,至吐番境則称布壘楚<sup>3)</sup>。

不过他还不清楚“抹处”即藏語的“馬楚”(ma chu),宗泐回來的道路跟刘元鼎所採取的路線完全一样,兩者所經過的河源当然也是一样。宗泐渡河之处,距河源尚有三百餘里,元鼎所渡河,河源也是在其南三百餘里,情形是完全相同的。这条入藏通道为唐代初開,其路線係自鄯州(西寧),經赤嶺(日月山),取道黃河上源,出札陵、鄂陵兩湖間,沿喀喇渠,越黃河、長江分水嶺而渡犂牛河(通天河),由此經当拉嶺以入拉薩(邏些),一直到清代入藏通道都是走这条道路。就總線言,古今沒有多少变更,作者在“歷史地理上的入藏通道”中已經論証了這一點。元鼎跟宗泐所經過的河源就是現在的喀喇渠,这有两个証据:(1)元鼎所渡河係自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這裏河很狹小,“春可涉,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就是黃河源,現在的喀喇渠正是自西南方流入星宿海跟鄂陵湖,而約古宗列渠的源头則在鄂陵湖近西稍偏北。河源在所渡河之南,只能是喀喇渠,絕對不是約古宗列渠;(2)宗泐明確指出: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顏喀喇山)西南所出之水流入通天河,东北之水就是河源。根据項言志、董在華的報導,喀喇渠的对面不正是通天河的上源,兩源相去只有十多公里嗎?宗泐所經過的黃河源跟通天河上源相对,其为現在的喀喇渠可說

1) 据錢謙益“列朝詩集”宗泐望河源詩序。

2) 最早確定犂牛河为金沙江上源当为明一統志:“金沙江即古麗水,源出吐番巴薩过拉木山,譯言乳牛石也,謂之犂牛河”。

3) 据稿堂叢書本。

是一百二十分的肯定。

### 三. 古代星宿海的範圍跟黃河源的關係

李先生文章的目的是辨明清以前河源知識早就超過星宿海以西，對傅樂煥先生“關於黃河河源問題”文中的說法（在清康熙四十三年拉錫探源以前，人們對於黃河正源的知識僅止於星宿海，到了康熙五十六年一些繪製地圖的人到河源地區測量後，才知道星宿海以西還有一段河流）提出不同的意見。其實這爭辯是不必要的，傳說誠有錯誤，但李先生也未弄清楚古代星宿海的範圍跟黃河源的關係。

星宿海跟黃河源很有些糾紛，現在星宿海的範圍究竟到了那裏，並不十分明確，古代所謂星宿海有時候就包括河源全部，他們甚至就拿星宿海當做河源的代名詞。所以文獻上的“河出星宿”並不能認為只限於狹義的星宿海，這有好幾個證明：（1）元都實探河謂河源出星宿，但據朱思本所記，真正的黃河發源是在星宿海西南百餘里；（2）清康熙帝一向留心地理，尤其對於幾條大河的源流，康熙六十年二月四日帶軍進藏的允禔奉到他一篇諭旨，詳細敘述諸各河的源流，要他們隨時留意考察是否有新的材料，其敘黃河謂：“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眾泉流出，沮洳漁散，不可勝數，望之如列星，蒙古名敖敦他拉，西番名蘇羅木，譯言星宿海也”<sup>1)</sup>，其時皇輿全覽圖已經告成，黃河源已經實地查勘為今約古宗列渠，可是仍謂源出星宿；（3）康熙五十九年李彩隨清軍自西寧經河源區入藏，著藏紀概，黃河南源喀喇渠定為“黃河祖源”就是這次發現的，根據他的入藏程站，星宿海的範圍東邊要包括鄂陵湖，西邊差不多就達到河源。隨清軍這次入藏的還有焦應旂著藏程記略，經過索力奔（即索羅木）及星宿海，跟李彩所走路線完全一樣，自西寧動身日期也差不多，但藏程記略中也謂河出星宿<sup>2)</sup>。

古代所謂星宿海的範圍有時是很籠統的，文獻上所謂“河出星宿”並不能機械地理解當時的河源知識僅止於現在的星宿海，有時候它是包括星宿海以西一段河流。說明白這個問題對於了解古代黃河河源的發展有些好處，同時也可以省却很多不必要的爭論。要是傅、李兩先生都明白這一點，作者想傅先生一定不會得出那樣的結論，而李先生也就用不着再多辯論了。

1) 藏紀概。衛藏通志卷三亦載之。這裏有個小錯誤，索羅木(Soloma)是蒙名非藏名，同時它是蒙古族叫黃河上源那段河流的名稱，譯言並不是“星宿海”。但從這裏也可看到黃河源跟星宿海的範圍是有些混亂的。

2) 見衛藏通志，卷四附錄。焦應旂到達河源約在李彩之後一月。

##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MAIN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Hwang Sheng-ch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resent article reveals the mistake Mr. Li Yuan-hsing (李元星) made in his article "The Earliest Date Traceable of the Main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Mr. Li based his article on the map drawn by Yang Tze Ch'i (楊子器)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at map, one can find below the Starry Sea (星宿海) two riverlets which Mr. Li ratiocinated to be the Yo Ku Tsung Lieh Chu (river) (約古宗列渠)——the main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its branches. He further inferred that the Yo Ku Tsung Lieh Chu was found, as early as the T'ang and Yuan Dynasties, to be the main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present article points out:

1. The map drawn by Yang Tze Ch'i followed the system of Chu Sze Pen's (朱思本) map. By comparing the portion of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on Yang Tze Ch'i's map and that on the map "Kwang Yü Tu" drawn by Lo Hung Hsien (羅洪先) it would be easy to perceive that there are some points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sets of maps.

2.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prospected in the three dynasties of T'ang, Yuan and Ming was actually the Ka La Chu (river) (喀喇渠) of the present day and not Yo Ku Tsung Lieh Chu (river).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found by Tu Shih (都實)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recorded by Chu Sze Pen was at a place of about 100 *li* due southwest of the Starry Sea, corresponding to the position of the Ka La Chu (river), and therefore it can be readily construed that it was nowhere but the Ka La Chu (river). Further proof has i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passed by Liu Yuan-ting (劉元鼎)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sung Leh (宗泐)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in reality, the Ka La Chu (river) of the present time. There are two points to prove:

(1) Liu Yuan Ting once pointed out that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was at a place about 300 *li* due south of the place where he crossed the river. Tsung Leh later harped on the same string. Judging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route leading to Tibet in the Ch'ing Dynasty and the present day, we are sur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mentioned by Liu Yuan Ting and Tsung Leh could only be the Ka La Chu (river) but not the Yo Ku Tsung Lieh Chu (river).

(2) According to Tsung Leh, water flowing out at a place southwest of Mo Pi Li Chih Pa Mountain (抹必力赤巴山) runs into the T'ung T'ien River (通天河), whereas the water flowing out due northeast is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The present source of the T'ung T'ien River just faces directly the source of the Ka La Chu (river). This is in accord with the statement made by Tsung Leh.

Finally, the author wishes to point out that the Starry Sea noted in the old records of the early days should sometimes include the s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ue west of it.